

瑞典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從「道德超級大國」到「地緣政治現實主義」

吳巨盟*

世新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摘 要

本研究探討瑞典外交於 2014 至 2026 年間，由「道德超級大國」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典範轉移。面對俄羅斯擴張，瑞典 200 年中立傳統與本體安全發生結構性的轉變。本文結合本體安全理論與新古典現實主義，並運用歷程追蹤與文本分析，深度探究其大戰略重塑之因果。研究發現，瑞典 2024 年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歷史轉折，並透過『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徹底揚棄「女性主義外交」之論述，確立了以「瑞典生存利益」與「拒止嚇阻」為核心的新戰略共識。在實踐層面，瑞典不僅將哥特蘭島等地緣要衝軍事化，藉以構築波羅的海的反介入／區域拒止防禦網；更透過嚴格的外資審查與 5G 通訊禁令，精準落實地緣經濟的去風險化，為中小型國家在強權競爭中維持戰略自主，提供具解釋力的範例。

關鍵詞：瑞典外交政策、小國外交理論、女性主義外交、典範轉移、本體安全

*主要經歷為世新大學國際事務長、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中華經濟研究院 WTO 中心助理研究員、民進黨國際事務部副研究員。並曾於中央研究院、比利時、荷蘭、英國、德國、法國等國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與研究。

壹、前言：兩百年中立的終結與新現實的降臨

瑞典外交政策在歷史長河中展現了極強的路徑依賴。自 1814 年拿破崙戰爭結束以來，瑞典維持了長達兩個世紀的軍事不結盟傳統。從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的觀點來看，這種「中立」或「不結盟」並非單純的安全策略，更經歷了長期的社會化過程，演化為瑞典國家認同（state identity）與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的核心支柱（Lundqvist, 2022）。然而，這場深植於國民認同的身分建構，在俄羅斯帝國復辟式擴張的野心下遭遇了毀滅性的外部衝擊，瑞典被迫面臨深刻的焦慮與身分斷裂。這也宣告了中立作為國家安全感來源的功能性消退。瑞典在 2024 年 3 月 7 日正式跨越歷史的里程碑，成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北約）第 32 個成員國，標誌著其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徹底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從宏觀的地緣政治進程來看，這一轉變並非倉促之舉，而是從 2008 年喬治亞戰爭、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直至 2022 年俄烏戰爭全面爆發，到隨後波羅的海頻傳的領空侵犯與混合戰爭威脅，瑞典戰略威脅認知不斷疊加的必然結果（Khorrami, 2024）。

瑞典從過去試圖透過道德例外論來維持區域穩定，轉向追求與西方盟友深度掛鉤的「集體防禦」。這一轉向在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 2022-）政府上台後更趨顯著，其果斷撤銷了曾具有高度象徵意義但已不合時宜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feminist foreign policy, FFP），將外交資源重新分配至實質的嚇阻與區域安全事務上。根據『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Statement of Foreign Policy 2026），斯德哥爾摩當局已正式且徹底地告別過去高舉「規範性權力」的理想色彩，全面轉向以嚇阻（deterrence）、社會韌性與集體防禦為核心的「戰略現實主義」（strategic realism）（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4）。

當前的瑞典外交展現了強大的內部連動性（synthesis）：在區域上，將北極與波羅的海視為不可分割的戰略整體；在地緣經濟上，透過「去風險化」（de-risking）與強化技術主權，確保供應鏈的安全與韌性，並以此鞏固其在北約內部的戰略信任。這種轉變反映了瑞典意識到：在當代混合戰爭

與大國競爭的時代，國家的「道德高度」必須建立在「硬實力」與「心理防禦」的基礎之上。本研究將系統性論述瑞典 200 年中立政策的終結與新現實的降臨，其如何透過安全架構的再定義、國家身分的重塑以及區域戰略的連動，應對此一不確定的地緣政治新現實。

貳、理論探討與研究方法

一、瑞典外交的典範轉移

本研究旨在解釋瑞典外交政策在 2014 年至 2026 年間發生的典範轉移。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典範轉移絕非只是國家在面臨外部重大衝擊後的零星政策微調，而是其「認知架構」(cognitive framework) 與「行動邏輯」(logic of action) 出現的根本性且不可逆的重塑。為了避免將瑞典近年的政策調整流於碎裂化的議題條列，本研究提出以下基準線，作為判定瑞典外交是否發生典範轉移的客觀標準：

1、舊有典範 (2014-22)

以「道德例外論」與「規範性權力」為認知架構。其核心假設認為小國的安全與尊嚴源自於與強權政治保持距離，並透過多邊主義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進行全球道德訊號的單邊建構；其行動邏輯強調道德性與制度避險 (hedging)。

2、新興典範 (2022-26)

瑞典開始轉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其認知架構將國家生存利益置於絕對優先，核心假設認為在動能 (kinetic) 軍事威脅與修正主義強權前，安全不可分割且規範缺乏物理防護力；其行動邏輯則展現為「戰略合成」(strategic synthesis)，亦即將過去零散的區域防衛、技術主權、資源開發與社會韌性等，全面融合在以集體防禦與拒止嚇阻 (deterrence by denial) 的地緣現實主義政策之中。

基於上述清晰的檢驗標準，本研究內容將從區域戰略、地緣經濟避險及總體國防 3 個面向，深度剖析多項看似多元分散的政策議題，如何在地緣

現實主義行動中，共同合成瑞典在動盪時代中的新型戰略自主性與韌性。

二、理論探討

為避免單一理論視角的盲點，本研究採取「折衷主義」（analytic eclecticism）途徑，結合建構主義的「本體安全理論」與「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並運用歷程追蹤法（process tracing）與文本分析（document analysis）作為核心研究方法，探討瑞典如何從「規範性力量」轉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其外交轉型不僅是安全政策的調整，更是大戰略的根本重塑。

1、本體安全理論與角色重構：解釋認同破裂與轉型的動機

本體安全理論強調國家不僅追求生存，更追求自我認同的連續性與穩定性（Giddens, 1991; Kinnvall, 2004）。對瑞典而言，長達 200 年的軍事不結盟與中立傳統，早已非單純的安全策略，而是演化為其「道德超級大國」身分認同的基礎。本研究運用此理論剖析 2014-22 年間的女性主義外交，認為其本質是瑞典在冷戰後透過「規範性權力」實踐，以維持其本體安全感的一種身分策略。本理論的核心解釋貢獻在於：說明為何瑞典長期抗拒北約，並分析 2022 年後俄羅斯侵略如何導致瑞典的「本體焦慮」（ontological anxiety），迫使其必須透過重塑「可靠的安全貢獻者」身分，來重建國家的認同連續性（Lundqvist, 2022）。

2、新古典現實主義：系統壓力與國內變數的反應

外部系統性壓力（俄羅斯軍事擴張）只是促成瑞典外交政策轉向的結構性原因之一，無法直接改變外交政策，系統壓力必須透過國內層次的中介變數才能轉化為具體的外交決策。新古典現實主義為此提供了重要的解釋架構。本文特別聚焦於國內決策菁英對威脅的認知如何透過政黨政治的共識重組，促使瑞典政府將外交政策從「規範輸出」轉向「軍事嚇阻」與「地緣經濟避險」。此理論有效填補了建構主義忽略的政策實務，譬如國防預算佔比、外人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法案制定的不足（Khorrami, 2024）。

具體而言，從 2022 年 5 月時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Swedish Social Democratic Party）安德森政府（Magdalena Andersson, 2021-22）遞交北約申請書，到同年 9 月克里斯特松右翼政府執政成為關鍵的國內中介變數，其果斷撤銷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標籤，將外交政策轉向於「民主價值與國家生存利益」，這種「現實主義回歸」並不是瑞典單一政黨的政策，而是國內跨黨派菁英的「結構性共識重組」，並將外部威脅折射為具體的建軍（如國防預算佔 GDP 的 3.5%）、及加入北約的決策。

3、小國外交戰略的轉型：從「例外論」到「戰略現實主義」

小國外交理論用於說明瑞典作為小國，在兩極化或多極化競爭結構下的戰略空間。在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中，關於「小國」或「中等強權」外交戰略的辯論聚焦於「扈從」（bandwagoning）與「抗衡」（balancing）大國的二元對立。然而，瑞典的案例挑戰了此一傳統窠臼。瑞典傳統外交實踐就是一種典型的「例外論戰略」，即透過維持軍事不結盟並扮演「道德超級大國」，在兩極或多極體系中獲取獨特的規範影響力。然而，隨著地緣政治回歸硬實力對抗，學術界開始討論小國是否具備「戰略自主」的空間。

本研究主張，瑞典 2014-26 年的軌跡反映了小國戰略的轉型：即透過放棄「例外論」的戰略，藉由加入北約集體安全體系與歐盟（European Union, EU）地緣經濟架構，轉化為對西方同盟體系的「不對稱貢獻」，譬如放棄對威權供應鏈的依賴、將哥特蘭島的地理敏感性與關鍵資源（如半導體產業鏈）轉化為戰略籌碼。可說明瑞典如何透過戰略重組，從被動承受壓力的對象，轉變為影響區域安全格局的樞紐。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採用歷程追蹤法及文本分析法，結合政策文件分析進行探討。

1、歷程追蹤法：檢視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因果機制

為釐清瑞典外交政策從過往的「道德理想主義」轉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因果變遷，本研究採用歷程追蹤法。此方法不僅關注結果（加入北約），更深入探究決策過程中的關鍵時刻（critical juncture）。本研究將觀察區間設定為 2014 年至 2026 年，並將其劃分為 3 個關鍵歷程：

（1）規範性權力的極大化期（2014-22）

追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提出、實踐及其在應對軍事威脅時的侷限性（Khorrami, 2024）。

（2）外交典範轉移的震盪與重構期（2022-24）

分析俄烏戰爭爆發後，瑞典國內威脅認知的轉變、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退場，以及瑞典遞交北約申請書至克服土耳其、匈牙利政治杯葛，到正式加入的國內外折衝歷程。

（3）戰略現實主義的落實期（2024-）

檢視瑞典在北約架構下的實質戰略部署，驗證其政策產出。例如國防預算逐步調升至 GDP 的 3.5%、波羅的海戰略樞紐哥特蘭島（Gotland）的軍事化、及 2026 年 6 月起參與領導北約駐芬蘭的「前沿陸軍」（Forward Land Forces, FLF）等政策作為（Hägglom, 2024: 2; Wieslander, et al., 2023: 3）。

2、文本分析法：解構角色理論的身分重塑

本研究廣泛蒐集並系統性分析瑞典政府官方的初級文獻與智庫政策報告。分析標的包含但不限於：

（1）外交與國防聲明

深度解讀瑞典外交部發布的『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2024 年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以及瑞典外交部長瑪麗亞·馬爾默·斯蒂納加德（Maria Malmer Stenergard, 2024-）的公開演說等（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2024; Stenergard, 2024）。透過關鍵字萃取與論述分析，比對「女性主義」、中立等詞彙的消亡，以及「嚇阻」、「集體防禦」、「責任分擔」、「技術主權」等概念的崛起，藉此證明瑞典從「道德超級大國」向「負責任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轉換。

（2）地緣經濟與區域戰略文件

檢視 2026 年版《北極戰略》（*Arctic Strategy 2026*）的修訂內容（從環境合作轉向遏止俄羅斯），以及『外國直接投資篩查法』（*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等法案文本，以驗證瑞典在印太戰略與對俄羅斯、中國等威權國家實施「去風險化」的「地緣經濟避險」等實質作為與法制化過程（Khorrami, 2024: 10）。

透過上述理論架構的引導與研究方法的相互印證，本研究期望能為小國與中等強權在遭遇重大地緣政治衝擊時的外交決策轉型，提供具備普遍解釋力的實證研究基礎。

參、文獻回顧

學界針對瑞典近年外交政策演變的討論，已從早期「中立與不結盟」的議題逐漸聚焦於俄烏戰爭後的「戰略轉型」與「北約化」的關注。然而，既有文獻在解釋瑞典此一歷史性轉向時，往往流於政策事實的重述或單一理論的片面解讀，缺乏系統性的對話，為此，本章將既有研究整理為 3 大核心理論爭論，並指出其既有研究之不足。

一、爭論一：結構壓力下的權力平衡對比認同驅動的本體安全

第一個學術爭論聚焦於「物質性結構威脅」與「觀念性國家認同」何者才是驅動瑞典外交政策轉型的根本動因。傳統的現實主義學者主張，外部系統性壓力的質變是決定國家安全選擇的唯一關鍵。例如若從 Waltz(1979) 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的理論出發，可以論證自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至 2022 年俄烏戰爭爆發，波羅的海安全環境的不斷惡化，構成了一種客觀且不可逆的外部威脅結構。在此脈絡下，瑞典與北約的安全互動深化，本質上是為了反制俄羅斯修正主義崛起而進行的「外部抗衡」(external balancing) 實踐(黃國明，2023)。然而，此類物質主義(materialism) 的角度難以解釋：為何在同樣的結構壓力下，瑞典在 2014 年至 2022 年間仍堅持推行高度理想主義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並長期抗拒加入北約？

相較之下，建構主義學者則強調本體安全與身分認同的主導性。Lundqvist(2022: 73, 110) 與 Spindler(2025: 1) 指出，瑞典長達兩百年的軍事不結盟已內化為國家身分的「本體錨點」，放棄中立即等同於「自我認同的消亡」；他們認為瑞典的轉向並非完全基於客觀威脅的計算，而是芬蘭主動尋求加入北約所引發的同儕效應，打破了北歐的「本體平衡」，迫使瑞典面臨「不結盟認同」與「實質孤立風險」間的身分焦慮。

上述爭論呈現了「物質威脅」與「身分認同」的二元對立。現實主義者忽視了觀念性認同對政策轉型的阻礙，而建構主義者則往往高估了觀念的自主性，未能解釋內部決策菁英如何將外部的戰爭威脅「折射」為認同的修正。本文所採取的「分析折衷主義」正是為了解除此一理論對立，探究外部結構壓力如何透過國內政治過程，轉化為本體認同重構的動能。

二、爭論二：歷史制度主義的路徑依賴對比結構危機下的關鍵時刻

第二個爭論在於瑞典外交的轉變究竟是「漸進式累積」的量變，還是「關鍵時刻」下的斷裂性質變。歷史制度主義（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學者傾向於將瑞典中立政策的調整視為一個長週期的制度演進過程。楊三億（2024：101）對此提出了極具說服力的論證，他指出，多數觀點將瑞典拋棄中立歸因於 2022 年俄烏戰爭的突發威脅，但這僅是政策轉型的「末階段」。事實上，從 1995 年加入歐盟（象徵政治中立的放棄）、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後的『東道國支援協定』（*Host Nation Support Agreement, 2016*），瑞典的中立政策早已處於「制度遞移」與漸進式調整之中。早在冷戰結束初期，蘇秀法（1992：24、34）便已指出，瑞典申請加入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 EC）的決定，本質上已與其傳統的「神聖中立」產生了結構性張力，預示了中立制度的長期鬆動。郭秋慶（2015：47、62）亦從「武裝中立」的實務運作分析，指出瑞典在承平時積極參與國際維和行動與北約架構，其「不結盟」在實踐中早已具備高度的彈性與虛化特徵。

然而，另一派學者則堅持 2022 年俄烏戰爭構成了一個無法被「漸進論」涵蓋的「關鍵時刻」。他們認為，2022 年之前的政策微調並未動搖「不加入北約」的紅線；而 2022 年的衝擊直接促成了決策模式的斷裂，使兩百年的制度慣性在短短數週內瓦解（Braw, 2022）。湯紹成（2023）在分析北約峰會動態時亦指出，瑞典克服土耳其與匈牙利杯葛的政治折衝，展現了危機決策下高度的「權宜性與非路徑依賴」特徵。

既有文獻雖然注意到了時間長度的不同特徵，但未能將 2014-22 年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實踐期」與 2022-26 年的「加入北約轉型期」放在同一

個因果鏈中檢視。本研究認為，正是 1995 年至 2022 年間長期累積的「制度虛化」，才使得 2022 年的「關鍵時刻」得以發生；而 2024-26 年的戰略落實，則是將漸進演進與危機轉折進行「戰略合成」的結果。

三、爭論三：進步價值「女性主義外交」對比地緣經濟「去風險化」

第三個爭論點在於，瑞典外交政策的本質，究竟應被理解為以「價值觀與人權」為導向的規範性外交，還是以「生存與科技主權」為導向的地緣經濟避險。在 2022 年以前，關於瑞典外交的討論多聚焦於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規範引領作用。一般認為，瑞典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指出其透過權利（rights）、代表權（representation）、及資源（resources）的制度化實踐（即 3 R's）成功將性別平權與國際援助綁定，展現了小國獨特的規範影響力。此一時期，瑞典外交的重點在於「塑造國際規範」。

然而，近年研究則轉向關注瑞典如何應對威權國家的「銳實力」（sharp power）與供應鏈武器化。葉耀元（2020：33-35）以瑞典全面關閉孔子學院為實證案例，指出瑞典對中國的態度早在 2015 年起便因中國銳實力滲透而發生根本性轉變，從前期的經濟交往，轉向以維護自由民主價值與安全防禦為核心的制度化抵抗。這項研究揭示了瑞典「地緣經濟安全化」的先期徵兆。同時，Panda 與 Duggal（2024）則進一步指出，瑞典加入北約的戰略考量已延伸至印太地區，特別是海上交通線安全與關鍵半導體供應鏈的韌性。由於全球能源與商品貿易的相互關聯性，瑞典必須將其卓越的軍工科技實力（如紳寶 Saab）與民主國家的技術主權進行垂直整合，以對抗中俄修正主義同盟的威脅。

目前學界對於女性主義外交的討論與地緣經濟去風險化的研究呈現平行發展。本研究嘗試將「廢除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標籤」與「建立地緣經濟去風險化機制」視為瑞典外交政策的兩個面向——前者是清除多餘的道德負擔，後者則是建構實質的國家生存防禦。

四、文獻回顧小結：國家認同危機與本體安全的重塑

瑞典長達兩百年的軍事不結盟不僅是安全策略，更是國家認同的核心。Lundqvist (2022) 從建構主義的本體安全角度出發，指出瑞典在面對俄羅斯威脅時，其放棄中立的決策並非完全自主，而是受到芬蘭主動尋求加入北約的深刻影響。芬蘭的轉向打破了北歐的安全平衡，迫使瑞典面臨「不結盟認同」與「實質孤立風險」間的身分危機，進而促成了兩國聯合申請入約的歷史性決定。順著此一邏輯，Khorrami (2024) 進一步全面檢視了瑞典「戰略位移」，論證瑞典正經歷從高舉道德的旗幟朝向適應北約成員國的轉變，加入北約不僅是一段複雜政治的過程，更是在重新定義自身於國際體系中的前進路徑，正式宣告了以規範性權力為主的「道德國家」時代的終結（參見表 1）。

表 1：瑞典外交戰略轉型的分析

外交戰略 轉型	2022 年前傳 統定位	2022 年後新定位	本文解釋與定位
外交與認同	道德超級大國 女性主義外交 政策	務實生存者 國家生存與安全優先， 道德規範性論述退場	本體安全 vs. 物質利益 外部威脅引發本體焦慮， 促使瑞典進行角色重構， 以現實主義重新定義國 家安全
安全與軍事	軍事不結盟 和平時期的防 禦姿態	加入北約 總體國防與反介入區 域拒止部署升級，波 羅的海防禦一體化	路徑依賴 vs. 關鍵時刻 外部威脅疊加經過國內 政黨共識中介，在 2022 關鍵時刻打破歷史制度 慣性，採取拒止嚇阻
經濟與科技	高度開放自由 貿易 對中俄市場及 供應鏈相對依 賴	經濟安全武器化 配合歐盟戰略自主與 去風險化	規範性權力 vs. 地緣經 濟避險 小國為消除系統性脆弱 性，主動將技術主權與供 應鏈韌性整合進集體安 全網，以防範互賴武器化

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意涵與全球影響

一、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意涵：解構傳統安全與 3 R's 架構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提出，本質上是對傳統國際關係理論中以「國家中心主義」(state-centric) 與「無政府狀態」(anarchy) 為核心的現實主義傳統進行解構。傳統外交將「國家安全」等同於領土完整與軍事嚇阻（即所謂的「高階政治」），往往忽視了結構性暴力對個人、特別是邊緣化群體與女性等的壓迫（吳鵬飛，2023：10-12；黃國明，2023）。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理論意涵，首先體現於將外交軸心從「國家安全」轉向「人類安全」(human security)，主張唯有當社會中最脆弱的群體獲得免於恐懼與匱乏的自由時，真正的和平與穩定才有可能實現。在具體操作定義與概念內涵上，學術界與實務界多將其界定為高度結構化的 3 R's 分析與行動架構（Adebahr & Mittelhammer, 2020: 10-12）：

1、權利

要求外交政策必須積極促進全球女性免於暴力（特別是衝突地區的系統性暴力）的自由，並在多邊法律體系中推動性別平等與基本人權的制度化保護。

2、代表權

強調打破外交與和平談判中長期由男性政治菁英壟斷的家長制結構，主張提升女性在跨國決策機制、衝突調停及駐外使領館中的實質參與比例與決策話語權。

3、資源

國家必須透過「性別預算審查 (gender budgeting)」等官僚體制工具，確保政府開發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 與外交財政資源的分配，能精確向提升全球婦女經濟賦權、醫療教育等項目傾斜。女性主義作為一種「規範性權力」，瑞典試圖透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道德感召力與價值觀論述來引導其外交政策與形塑國際秩序的發展。透過 3 R's 架構，瑞典的外交政策超越了純粹的修辭宣示，轉化為一套具備可操作性與制度化評估指標的外交大戰略（吳鵬飛，2023：13-14）。

二、歷史發展與調適軌跡：瑞典與加拿大的典範分流（2014-26）

從歷史發展的時間線來看，女性主義外交經歷了從瑞典的「典範開創」、加拿大的「功能延伸」，再到地緣危機下的「實務調適」等不同發展階段。瑞典中間偏左聯合政府在 2014 年 10 月，由外交部長瑪格特·瓦爾術倫（Margot Wallström, 2014-19）正式宣告實施全球首創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開啟了規範性外交的制度化實驗。瑞典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定位為「全面性大戰略」，試圖將性別視角全面植入於雙邊經貿、多邊安全在內的所有外交主權領域（Adebahr & Mittelhammer, 2020: 10; 吳鵬飛，2023：14-15）。

隨後在 2017 年 6 月，加拿大自由黨政府推出了「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feminist 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policy, FIAP），成為繼瑞典之後全球第二個將女性主義列為核心外交架構的國家。然而，加拿大的歷史發展路徑與瑞典存在顯著分流。加拿大採取了「專注式國際援助戰略」（targeted assistance strategy）的路徑，將女性主義高度聚焦於海外經濟援助與跨國發展合作，策略性地避免了讓價值宣示與其核心的北美防務或重商經貿利益產生直接正面衝突（Bigio & Vogelstein, 2020: 2-3）。歷史發展的重大轉折點發生於 2022 至 2026 年之間。隨著俄烏戰爭全面爆發，歐洲地緣安全環境劇烈惡化，身處第一線承受物理安全威脅的瑞典，於 2022 年底新右翼聯合政府上台後，正式宣布撤銷「女性主義外交」的論述標籤。到了『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瑞典的外交核心全面轉向北約集體防禦。

然而，歷程追蹤的實證研究顯示，此時期的歷史發展應被理解為「外交語義學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非政策內涵的徹底終結。瑞典雖然卸下了女性主義的政治標籤，但過去 10 年在官僚體制內深植的 3 R's 機制，如瑞典國際發展合作署（Swedish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Agency, Sida）內部的性別預算審查與婦女援助項目等，依舊獲得延續與執行。相較之下，享有北美地理安全屏障的加拿大，在 2024-26 年間則繼續維持並深化其「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兩國的發展分流證明了：女性主義外交的歷史演變，本質上受到國家地緣政治脆弱的動態制約（Adebahr & Mittelhammer, 2020: 12; 郭秋慶，2015：47；楊三億，2024：47）。

三、女性主義外交的核心意義：國家身分重塑與本體安全的追求

探討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意義」，必須深入其對中等強權國家身分建構的深層影響。從建構主義的理論視角出發，中等強權在國際體系中往往缺乏可與超級大國抗衡的硬實力，因此必須透過積極的「規範企業家」(norm entrepreneur) 角色，累積軟實力並爭取國際秩序中的道德話語權。

對瑞典而言，實施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核心意義在於追求本體安全。冷戰結束後，瑞典傳統上作為東西方「中立調停者」的獨特國家身分隨著加入歐盟而逐漸模糊。提出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讓瑞典得以將國內的性別平等規範向外投射，成功在國際社會中將自身重塑為「道德超級大國」。這種身分的價值認同不僅強化了瑞典對外政策的道德正當性，也為其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國際多邊舞台上創造了超越其物質權力的政治影響力。因此，女性主義外交的深層意義，絕非單純的道德修辭，而是中等強權在多邊體系中進行身分管理 (identity management) 與確保國家自尊的核心戰略工具。它向國際社會證明，性別平等不僅是一個內政議題，更是評估一個國家是否具備「進步秩序維護者」資格的國際正當性指標 (Adebahr & Mittelhammer, 2020: 11-12; 吳鵬飛, 2023: 13)。

四、全球與體制影響：規範擴散、外援轉型與體系穩定

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自 2014 年創始以來，對全球外交體制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主要展現在以下 3 個層面：

1、引發了全球性的「規範擴散」效應

在瑞典與加拿大的示範效應下，包含法國、美國、澳洲、墨西哥、挪威及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等諸多跨越歐美的國家，紛紛在 2020 至 2025 年間宣布採納不同形式的女性主義外交政策與作為。這使得性別平權逐漸從邊緣性的低階政治議題，轉變為當前多邊外交治理的主流議程之一 (Bigio & Vogelstein, 2020; 吳鵬飛, 2023: 20-22) (見表 2)。

表 2：全球主要國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倡議

國家	領導職位與承諾	關鍵政策與策略	性別預算或資助金額	優先領域	女性參政比例(推論)
瑞典	2014 年成為首個採納「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設有性別平等大使	全球性別平等策略(2018-22)；涵蓋外交、安全、發展合作與貿易	2 億瑞典克朗(SEK)支持 She Decides 倡議；10 億瑞典克朗執行全球性別策略	外交、安全政策、發展合作、貿易與推廣	內閣女性比例達 50% 或以上
加拿大	總理杜魯道承諾任命性別平衡內閣	2017 年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FIAP)；2018 年通過《加拿大性別預算法》	向平等基金 (Equality Fund) 捐助 3 億加幣；目標是 15% 的援助專門用於性別平等	國際援助、貿易（含性別專章）、維持和平	內閣女性比例達 50% 或以上
法國	承諾性別平衡內閣	第三個國際性別平等策略；推行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承諾將性別平等援助比例提高至 50%；撥款 1.2 億歐元支持女性主義運動	外交、國際發展	內閣女性比例達 50% 或以上
美國	2009 年設立全球婦女議題無任所大使，為全球首創	2012 年啟動首份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中的性別平等政策指南；2017 年通過《女性、和平與安全法案》	資助女性創業融資倡議 (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 We-Fi)（總額 3.54 億美元之一部分）	外交、國防、國土安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經濟賦權	女性國會議員比例低於 30%，大使比例低於 30%
澳洲	1984 年引入性別預算制度	2016 年性別平等與女性賦權策略	5500 萬澳幣 (AUD) 的性別平等基金；目標是 80%	外交、發展援助、區域安全	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高於 30%

表 2：全球主要國家女性主義外交政策倡議（續）

墨西哥	2020 年成為全球南方國家首個發布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國家	五項指導原則，包括外交部內部的平權與打擊性別暴力	未設立單一專項金額，但全面實施外交部內部性別預算與主流化機制	外交、多邊談判、貿易 (NAFTA)	外交部 11 個高層職位中僅 1 位女性；目標 2024 年達成就業平權
挪威	設有「女性、和平與安全」特別特使，並長期實施內閣與外交高層性別配額	外交與發展政策中的女性權利與性別平等行動計劃	設定至少 85% 的官方發展援助 (ODA) 必須有效涵蓋或促進性別平等	教育、政治參與、經濟權利、性與生育健康	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高於 30%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UAE)	2015 年成立「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性別平衡委員會」(UAE Gender Balance Council)	發布「100%女性」政策，旨在 2021 年前將性別平等納入所有外援項目	承諾 100% 外國援助項目需涵蓋性別平等議題	外交援助、經濟發展	女性國會議員比例高於 30%

來源：本研究自行整理自 Bigio & Vogelstein (2020)，部分內容業經更新與補充。

2、推動了全球國際援助體制的實質轉型

根據經濟合作組織發展援助委員會（OECD-DAC）的資料顯示，受到瑞典與加拿大「性別預算審查」與「女性主義國際援助政策」的制度影響，各主要援助國在配置海外資金時，強制納入「性別標籤」（gender marker）的比例大幅提升。這促使全球發展合作項目必須實質關注婦女經濟賦權與性別暴力的消弭，帶來了全球治理體制在資源分配上的結構性變革（Bigio & Vogelstein, 2020: 2-3）。

3、揭示了進步規範與地緣現實主義之間的平衡

然而，在 2022 年 2 月俄烏衝突發生後，瑞典外交政策發生的典範轉移，對全球進步外交實務產生了重大的警示影響。其證明了當國際體系遭遇極端的安全威脅（如威權強權擴張）時，將價值規範凌駕於生存利益之上的大戰略將面臨巨大的存續壓力（楊三億，2024：52；黃國明，2023）。然而，瑞典政府採取「去標籤化但保留實質項目」的調適路徑，也展現了女性主義外交在官僚體制化後的內生韌性。這種規範資產的隱性存續，將持續影響未來國際關係在價值與利益雙軌並進時的戰略調適邏輯。

伍、身分認知的重塑：女性主義外交興衰與務實回歸

在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家身分界定了外交政策的邊界與選擇偏好。瑞典從「道德超級大國」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者」的典範轉向，並非只是單純的政黨輪替，而是瑞典為回應俄羅斯修正主義所帶來的「本體焦慮」，而進行的身分重塑過程。

一、道德大國的建構與女性主義外交的侷限

正如 Kinnvall（2004: 12）所言，當國家所處的外部環境發生劇烈變遷時，過度依賴「瑞典例外論」（Swedish Exceptionalism）的身分實踐，會造成與現實環境的認知落差。當動能（kinetic）軍事威脅迫在眉睫，且獨裁國家拒絕遵守國際法時，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道德優先性與瑞典迫切的物理安全需求產生了邏輯上的張力，使其在面對極權國家對國際法規的公然踐

踏時，顯得缺乏實質的嚇阻效力。

二、『外交政策聲明』中「女性主義外交」標籤撤銷與政策轉向

透過文本分析法對比 2014-22 年間與 2022 年之後的瑞典『外交政策聲明』，可清晰勾勒出其內部政治邏輯的轉軌。在 2014 至 2022 年由社會民主黨執政期間，外交聲明中高度充斥著「性別平權」(gender equality)、「全球裁軍」、「人權倡議」與「人道救援」等軟實力詞彙；外交政策被設定為服務全球進步價值的工具。

然而，當 2022 年由溫和黨領軍的右翼執政聯盟上台後，官方文件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其核心意圖在於「外交語義學」的去政治化與聚焦化。克里斯特松政府正式撤銷了女性主義外交政策標籤。時任外交部長比爾史特龍 (Tobias Billström, 2022:24) 在政策說明的官方發言中，明確給出了「女性主義外交」退場的核心原因：「使用『女性主義外交政策』這個標籤，已經掩蓋了我們政策的實質內容。這正是為何政府將停止使用該詞彙的原因；然而，我們將始終支持性別平權」(Billström, 2022: 2)。這段關鍵論述顯示，瑞典決策層意識到，在俄羅斯軍事威脅急遽升高的地緣政治環境下，過度強調意識形態標籤，反而造成了戰略上的模糊，無法準確向國內外傳遞瑞典面臨生存危機時的優先次序。

從《2024 年國家安全戰略》到最新的 2026 年官方聲明，「女性主義」一詞作為外交大戰略的指導原則已全面退場，取而代之的是「拒止嚇阻」、「國防戰備」(defense readiness) 與「瑞典利益」(Swedish interests) 等傳統的現實主義詞彙。2026 年 2 月 18 日，現任外交部長史特內加德在向國會提交的『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中，為這場典範轉移定調。她明確指出當前瑞典外交的 3 大核心任務為：支持烏克蘭並增加對俄羅斯的壓力、強化安全與貿易合作及確保性別平權 (Stennergard, 2024;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1)。儘管性別議題仍被保留，但其已降格為單一議題，而非涵蓋整體的架構。

三、角色重構與現實妥協：應對土耳其與匈牙利審查其北約入會

瑞典身分轉變的最劇烈陣痛，發生在其爭取加入北約的過程中，尤其在面對土耳其與匈牙利刁難時的「角色妥協」。作為昔日的「人權庇護所」，瑞典長期在國際舞台上聲援庫德族，並對土耳其的獨裁統治進行制裁。然而，為了獲得安卡拉的人約同意票，瑞典在民主人權與國家生存利益之間做出了極度務實的讓步。象徵瑞典已將「國家生存利益」置於「道德價值宣示」之上。

瑞典不僅修改了國內的『反恐法』（*Act on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for Terrorist Offences, 2003; Terrorist Offences Act, 2022*）以加強對庫德工人黨（Kurdistan Workers' Party, PKK）相關組織的打擊，還恢復了對土耳其的武器出口，更在法理允許的邊緣將部分爭議人士引渡回土耳其。同時，面對匈牙利奧班（Viktor Orbán, 2010-26）政府的杯葛，瑞典也透過軍售承諾（如 JAS-39 獅鷲戰鬥機的租售協議）來排除障礙。這種以利益交換換取安全保障的實踐，象徵著瑞典正式放棄了「人權仲裁者」的角色，以實現向「地緣政治生存者」的角色重構（Etzold, 2024: 1-4）。

四、從例外主義到集體防禦：本體安全感的轉移與 4 大戰略利益

當前瑞典的「本體安全感」已不再來自於那種「優於強權政治、置身事外」的道德優越感，而是轉向透過積極成為北約體系中「負責任、可依賴且具備實質貢獻能力的盟友」來尋求庇護與認同（Lundqvist, 2022）。這種從「自我孤立的道德感」向「集體防禦的團結感」的過渡，是瑞典真正意義上回歸歐洲權力政治核心的體現。2024 年 12 月 11 日，瑞典外交部長史特內加德（Stenergard, 2024）發表具歷史定調意義的專文與演說，明確提出瑞典外交政策未來的四大方向與關鍵利益：

1、重塑威懾信號：確保北約嚇阻力

瑞典不僅將國防預算提升至 GDP 的 3.5%，更將國防結構從「領土自主防衛」轉型為「集體防禦整合」。這意味著瑞典的軍力部署將完全融入北約的聯合作戰計畫中，藉此消除俄羅斯對北歐防禦真空的誤判，實現從「被動

防守」到「主動嚇阻」的戰略跨越。

2、區域戰略整合：波羅的海的防禦樞紐化

鑑於波羅的海已轉變為「北約的內海」，瑞典的角色亦從「波羅的海沿岸國」提升為「區域戰略的防禦屏障」。瑞典透過哥得蘭島的軍事化與武力部署，與芬蘭等波羅的海國家構成聯動防禦堡壘，確保該區域免於俄羅斯的封鎖或軍事訛詐。

3、規則導向與國家利益的辯證：國際法的務實詮釋

瑞典並未完全放棄對國際法的支持，而是採取了更為現實主義的態度：將「維護國際秩序」與「確保瑞典自身利益」進行直接連結。這種調整反映了瑞典意識到，唯有在一個穩固的西方安全集體中，瑞典所倡導的民主法治價值才具備生存的政治空間。

4、地緣經濟的韌性：從開放貿易到戰略去風險化

在經貿領域，瑞典採取了更為嚴謹的防禦策略。落實關鍵基礎設施（如 5G）與敏感技術（如半導體）的外資審查機制，旨在防範戰略互賴（strategic interdependence）遭到敵對勢力「武器化」。透過與歐盟及印太民主國家的技術同盟，瑞典將「經貿互惠」轉化為確保「國家技術主權」的戰略資產。

外交部長斯蒂納加德直言，瑞典外交政策長久以來以追求成為「道德超級大國」（moral superpower）及避免選邊站隊為特色的時代已經結束。瑞典將外交與安全政策任務委由他人承擔的歷史已經轉變；如今，瑞典與盟邦必須具備憑藉自身硬實力捍衛利益和價值觀的能力，方能在殘酷的國際體系中贏得尊重並確保生存（Stennergard, 2024）。

陸、自道德超級大國向地緣政治現實主義的戰略重塑

本研究認為，瑞典外交政策自 2014 至 2026 年間的劇烈轉變，並非零碎、權宜的政策微調，而是總體外交戰略的典範轉移。根據政策變遷理論（Hall, 1993），「典範轉移」屬於第三階變遷（third-order change），意指國家導向政策的核心認知架構與行動邏輯出現結構性的翻轉。本研究為瑞典外交的典範轉移確立了雙重檢驗標準：

1、認知架構的重組

瑞典是否制度性地揚棄過去以「軍事不結盟」與「道德例外論」為核心的舊典範，即 2014 至 2022 年間奉行的「道德超級大國」與「女性主義外交政策」。

2、行動邏輯的翻轉

瑞典是否轉向以集體防禦、生存利益、硬實力「拒止嚇阻」及地緣經濟「去風險化」為核心的新典範，即 2024 至 2026 年的「地緣政治現實主義」（geopolitical realism）。

透過此一理論架構，本節將北約入盟、波羅的海防衛、地緣經濟避險與總體國防 2.0 等看似分散的議題進行「戰略合成」，藉以清晰論證新舊典範的替代軌跡，化解議題重疊導致主軸模糊的潛在限制。

一、認知架構的重組：從道德例外向生存與拒止嚇阻的轉型

瑞典外交部長史特內加德在 2026 年 2 月 18 日向國會提交『2026 年外交政策聲明』中，確立了生存利益高於規範價值的指導原則：「我們選擇保護瑞典與瑞典人民的安全。瑞典的北約會員資格使我們的國家更加安全。在動盪的時代，我們不再孤立無援（We do not stand alone in troubled times）」（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2）。此一宣告標誌著瑞典正式告別過去的道德例外論的傳統，將國家生存利益置於大戰略的最高位階。在新典範的行動邏輯下，瑞典將其外交與國防核心確立為「拒止嚇阻」。有別於傳統以報復為手段的「懲罰性嚇阻」（deterrence by punishment），拒止嚇阻旨在透過構建極高的防禦門檻，使對手在決策階段即意識到任何侵略行為均無法達成實質戰術目標，且須付出無法承受的戰略成本（Braw, 2022; Wieslander, et al., 2023: 5）。

在外交實踐上，此種從「道德例外」向「現實主義」的跨越，最具體地展現在應對土耳其與匈牙利對瑞典加入北約的談判過程中。當時瑞典放棄了過去與威權國家保持距離的「道德潔癖」，展現出高度務實的政治妥協，瑞典自覺地將過去「道德超級大國」的身分轉化為對北約集體防禦的實質

貢獻，從而追求不確定時代中的國家安全（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12）。

在安全防衛的層面，瑞典充分利用其獨特的「群島地理」（archipelago geography）作為天然掩護，部署 RBS-15 Mk4 移動式反艦飛彈與愛國者防空系統。這些載台結合高度整合的情監偵（ISR）與電子戰（EW）系統，實現了波羅的海的「絕對透明化」。這種將自然地理優勢「數位化與武器化」的過程，在狹窄的近海空間成功構建出強大的「反介入/區域拒止」（A2/AD）優勢，有效地將防禦縱深從瑞典本土向外延伸至整個波羅的海盆地（Khorrami, 2024）。

二、行動邏輯的物質支撐：國防財政質變與軍事機動性

為實質維持新典範下的戰略轉型，瑞典政府進行了冷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國防與基礎建設財政結構調整，以物質硬實力取代過往對國際規範的依賴：

1、軍事預算與裝備之不對稱升級

瑞典承諾提升國防預算，短期提高至 GDP 的 2%，並朝向 3.5% 的長期目標邁進。其核心在於將預算精準分配於制空與制海權的鞏固。根據瑞典國防研究局（FOI）的評估，這包含將空軍獅鷲獸戰鬥機（Saab JAS 39 Gripen）全面升級，以及海軍具備絕氣推進系統（Air-independent propulsion, AIP）的布萊金厄級潛艦（Blekinge-class submarine, A26）的加速部署。這些裝備專為波羅的海的淺水與複雜地形設計，成為反制威權國家混合戰與水下威脅的核心利器（Häggblom, 2024: 1-15）。

2、提升「軍事機動性」作為後勤支柱

現代嚇阻的有效性取決於增援的速率。瑞典額外挹注資源於提升「軍事機動性」，包括擴建港口、鐵路與公路網等。在實踐上，瑞典已將其領土打造為北約部隊的西北歐後勤樞紐，確保盟軍重型裝備能透過瑞典迅速且無縫地支援挪威與芬蘭，極大化北歐北翼的危機反應效率，展現出集體防禦的空間融合（Detsch, 2024）。

三、地緣要衝防衛與本體安全：哥特蘭島與前沿陸軍的戰略轉向

自 2024 年正式加入北約後，瑞典從波羅的海的「安全灰色地帶」轉型為北約北翼的「安全支柱」。此一轉變的核心節點在於哥特蘭島的重新軍事化。該島位於波羅的海中心，扼守加里寧格勒與聖彼得堡駛入北海的航道。瑞典在該島部署常備部隊與防空系統，使其形同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艦」，有效箝制俄羅斯波羅的海艦隊的活動空間，並為北約在該區域的空中與海上行動提供關鍵掩護（Wieslander, et al., 2023: 7）。

更具深遠歷史與「本體安全」意義的是，瑞典於 2026 年開始領導位於芬蘭境內的北約前沿陸軍。這一軍事部署在瑞典戰略文化中具有深刻的心理修補意涵：1809 年芬蘭戰爭中，瑞典將芬蘭割讓給俄羅斯，造成了長達兩世紀的地緣戰略與國家認同創傷；如今，瑞典以北約「安全領導者」與防衛提供者的身分重返芬蘭土地（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這不僅是為了應對當下威脅，更是瑞典在心理層面修補歷史斷裂，與北歐各國共同建立全新集體安全架構的里程碑。透過歷史縱深觀察，瑞典當前的決策邏輯，源於對「區域權力真空」與「過度依賴經濟互賴」的深層反思。表 3 詳細對比了波羅的海歷史與當代的安全危機，突顯了瑞典揚棄「中立陷阱」的必然性。

瑞典正極力避免重蹈歷史上的「漢薩陷阱」（Hansa Trap），即擁有綿密的全球經濟連結，卻在關鍵時刻缺乏硬實力保障。透過加入北約集體防禦，瑞典將歷史上的「波羅的海帝國」防禦思維，轉化為現代民主同盟的多邊協作機制，確保其技術優勢與民主生活方式不因區域權力真空而遭到威權國家蠶食。

表 3：波羅的海安全危機歷史與當代的對比

特徵	近古時期（15-16 世紀）	當代（21 世紀初）
主導力量之衰落	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因無法維持貿易壟斷且缺乏統一軍事力量而衰亡	後冷戰時期「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與「透過貿易促成轉變」的幻想破滅，受到中、俄等修正主義國家的武力與經濟脅迫挑戰
安全真空地帶	立夫尼亞（Livonia）（約今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因政治羸弱與派系分裂，成為瑞典、丹麥、俄羅斯、波蘭四國爭奪的「灰色地帶」與犧牲品	瑞典與芬蘭加入北約前，處於北約集體防禦體系外的「安全灰色地帶」，面臨俄羅斯的非對稱威脅、核武恫嚇與混合戰爭操作
瑞典的生存策略	訴諸武力突破丹麥的包圍網，為新生的世襲王朝尋求穩定的經濟資源，並建立控制波羅的海的軍事霸權	突破長達兩世紀的「中立陷阱」，主動將其人工智慧、軍工與半導體技術主權整合進北約集體安全網，以集體防禦取代孤立中立

來源：張閔煊（2022：52、54、67）。

四、地緣經濟避險：技術主權與信任鏈的建構

在新典範下，「經濟安全」已不再單純屬於重商主義的自由貿易邏輯，而是被提升至「國家生存與同盟信任」的戰略高度。瑞典將對威權國家的「去風險化」視為鞏固其在北約內部信任度的重要籌碼，包括下列議題：

1、技術主權作為安全防火牆

瑞典嚴格執行『外國直接投資篩查法』，在關鍵基礎設施與高科技領域構築一道「制度防火牆」。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威權國家竊取關鍵技術，更是為了向北約盟友（特別是美國）證明瑞典是全球供應鏈中「可信賴的環節」。透過保護其技術主權，瑞典成功將其經濟韌性轉化為軍事集體安全的溢價

（Khorrami, 2024）。

2、數位基礎設施的去風險化

在數位通訊領域，瑞典郵政及電信總局（Swedish Post and Telecom Authority, PTS）將高風險供應商排除於 5G 網路建設之外（5G 禁令）。此決策的深層意義在於，「乾淨的網路環境」不僅確保了未來北約情報共享與軍事通訊的絕對安全性，更實質強化了瑞典與跨大西洋安全架構的同調性，清除了美軍進駐與北歐防空系統整合的疑慮。

3、確保關鍵礦產的取得

在歐盟推動『關鍵原物料法案』（*Critical Raw Materials Act*, CRMA）的過程中，瑞典正積極將自身定位為西方陣營「綠色與軍工轉型」的戰略樞紐。2023 年瑞典北部基律納（Kiruna）發現歐洲最大規模的稀土礦床（Per Geijer 礦區）（LKAB, 2023），瑞典試圖以此為籌碼，降低歐洲對單一市場供應鏈的依賴。透過將自身的天然資源與西方的整體去風險化深度綁定，大幅提升了其在歐洲地緣經濟安全版圖中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

4、印太戰略延伸與對台「民主供應鏈」之重構

隨著地緣政治重心向印太轉移，瑞典對台政策出現了顯著的轉變。傳統上，瑞典將台灣定位為共享自由民主價值的「理念相近夥伴」（like-minded partner），雙邊關係較侷限於民間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鮮少將台海議題納入實質地緣安全考量。然而，當前瑞典已將戰略視野制度化地延伸至印太區域，亦將台灣提升為關鍵技術與民主供應鏈之「經濟安全夥伴」。瑞典漸次認知到台海和平穩定是確保其自身「技術主權」與經濟韌性的關鍵資產，進而轉向推動雙邊在非紅供應鏈（non-red supply chains）上的垂直整合，藉此消除台、瑞在美、中大國競爭下的系統性脆弱性（systemic vulnerability）。

五、總體國防 2.0 與歐盟決策改革：社會韌性與認知主權戰略合成

瑞典外交典範轉移的最終目標，在於將內部社會韌性系統性地轉化為外部戰略嚇阻。沒有全社會的抗禦能力，前線的導彈與潛艦將形同虛設。

1、歐盟機制的現實主義化改革

在經歷了成員國對其北約入會案的長期惡意延宕後，瑞典深刻體認到「一致決」機制的脆弱性。因此，瑞典已在歐盟推動「條件多數決」(QMV) 以取代一致決。這不僅是程序修正，更是地緣政治現實的必然。瑞典認為，單一成員國的否決權已成為威權國家滲透並癱瘓歐盟決策的破口。透過推動條件多數決，瑞典試圖將歐盟轉化為更具戰略行動力的實體，使其能與北約的軍事嚇阻相輔相成，成為不受單一獨裁者勒索的防禦同盟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12)。

2、北極戰略的轉向

隨著極地冰層消融與新航道的開闢，瑞典 2026 年新版的《北極戰略》發生了根本性的質變。該文件徹底拋開 2020 年版以「氣候與環境合作」為優先的柔性基調，轉而將「遏止俄羅斯在北極的軍事擴張」列為首要目標。同時，為了反制中、俄在北極地區的戰略合作，瑞典正積極整合讓日本等印太地區具備高技術能量的民主夥伴進入北極治理對話，試圖將北極議題從純粹的地區事務提升為全球民主陣線的戰略前哨 (Hansen, 2024: 33-37; Khorrami, 2026)。

3、心理防禦與認知主權

瑞典於 2022 年成立「心理防衛局」(Psychological Defence Agency) 並引入人工智慧偵測與「預先反駁」(pre-bunking) 技術，構築一套社會化的認知免疫系統 (Porter, 2024)。這種總體國防的升級，解決了民主國家最脆弱的痛點—即資訊戰對決策一致性的干擾。當瑞典能有效抵禦外部的認知作戰，防止國內社會在危機時陷入混亂，其向北約承諾的「集體防禦義務」才具備真正的執行基礎。這正是瑞典將地緣防衛、經濟去風險與全社會韌性完美融合成「地緣政治現實主義」新典範的最終體現 (見表 4)。

表 4：瑞典女性主義外交與現實主義外交的比較

比較面向	女性主義外交 (2014-22) 洛夫文／安德森政府	地緣現實主義外交 (2022-26) 克里斯特松政府
核心價值	道德例外論與進步主義價值 透過全球首創的女性主	國家生存、捍衛瑞典利益 回歸國家生存與瑞典利

	義外交尋求本體安全感，形塑超越強權政治的道德超級大國形象	益之核心主軸。褪去道德例外論包袱，在主權安全遭受外部實質威脅時，轉向以硬實力為基礎、與盟邦共擔責任的「務實生存者」定位
主要目標	促進全球性別平權，在國際實踐 3 R's 架構，推動人權與裁軍，扮演全球地緣衝突的道德調停者	加入北約集體防禦、區域安全嚇阻。將國家角色從北約體系外的「安全灰色地帶避險者」，重構為區域安全的「實質貢獻者與提供者」
安全途徑	軍事不結盟、聯合國多邊主義、裁軍倡議 奉行歷史制度主義下的路徑依賴：「和平軍事不結盟，以利戰時維持中立」。防衛上依賴領土與主權的自主武裝國防；雖於 2014 年簽署『東道國支援協定』，但實質上仍排斥加入集體安全聯盟，並拒絕簽署可能損及道德高度的雙邊軍事協定	申請加入北約、雙邊防務協定、擴軍 改變兩百年的中立傳統，在 2024 年加入北約，並且與美國簽署『雙邊防務協定』（DCA）。大幅擴軍（國防預算提升至 GDP 的 3.5%，落實全面防禦），並將地緣要衝哥得蘭島軍事化
對俄態度	採取譴責兼顧對話的守勢平衡姿態 雖強烈譴責俄國修正主義並支持部分歐盟制裁，但仍強調外交斡旋與多邊框架下的對話管道，試圖維持波羅的海低張力局勢	將俄羅斯定性為系統性、長期性且存在性的安全威脅 全面揚棄對話幻想，實施全方位圍堵與嚴厲制裁；至 2026 年，瑞典主動承擔北約駐芬蘭前沿陸軍的領導角色，將戰略前沿外推，落實拒止嚇阻
經濟安全	高度開放的自由貿易導向，將經貿往來與國家安全脫鉤 對威權國家的市場與關鍵物資供應鏈存在高度路徑依賴，缺乏對相互依賴武器化的制度性防禦	推動地緣經濟去風險化與維護國家技術主權 經濟與國安深度掛勾：全面落實嚴格的『外國直接投資審查法』，實施 5G/6G 通訊排除威權供應商禁令，嚴格審查稀土與半導體等關鍵產業，防範基礎設施遭敵對勢力武器化

表 4：瑞典女性主義外交與現實主義外交的比較（續）

對台關係	價值夥伴、經貿與民主交流為主 將台灣定位為共享進步價值的「理念相近夥伴」。外交實踐上以民間經貿往來、文化教育交流為主，較少將台灣納入實質地緣安全考量	將台灣提升為關鍵技術與民主供應鏈之戰略安全夥伴 基於全球經貿與威權擴張的複雜關聯性，將戰略視野制度化延伸至印太區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是確保瑞典技術主權之關鍵資產，推動雙邊在人工智慧、能源政策與綠色轉型、6G 及次世代通訊，以及智慧醫療等非紅供應鏈的垂直整合，以現實主義立場消除瑞典的系統性脆弱性
------	---	--

柒、結論：在不確定時代的確定轉向

瑞典外交政策的典範轉移，在學術上標誌著擴張型理想主義（*expansive idealism*）的歷史終結，以及根植於國家生存利益之現實主義的強勢回歸。面對俄羅斯擴張威脅與美中戰略競爭的結構性壓力，瑞典已從過去試圖透過道德論述改變世界的「規範制訂者」（*norm-setter*），全面蛻變為具備強大軍工實力與清晰戰略認知的「現實主義行動者」（*realist actor*）。這項轉變並非短期的權宜之計，而是深思熟慮的長遠大戰略；透過鞏固卓越的技術主權與軍事嚇阻力，瑞典得以在零和博弈的大國競爭中，實質保全其民主價值與生存空間。

隨著 200 年的「中立與軍事不結盟」傳統正式走入歷史，斯德哥爾摩全面重塑了北歐乃至整個歐洲的安全架構。作為北約正式成員國，瑞典憑藉關鍵的地緣戰略地位（如哥得蘭島的重新軍事化與波羅的海防務的深化），以及具備高度競爭力的本土軍工複合體（如 Saab 與 BAE Systems 等先進防衛產業），無可避免地將在北約北翼發揮防務領軍作用，透過集體防禦機制建立起強大的「拒止嚇阻」能力。

更進一步來看，瑞典的「地緣政治現實主義」展現出多面向特徵，亦將傳統安全威脅與現代「地緣經濟去風險化」深度結合。面對威權國家的「銳

實力」滲透與對關鍵基礎設施的潛在威脅，瑞典對安全現實的認知已跨越單純的軍事防禦，更擴展至「技術主權」(technological sovereignty)的鞏固。這具體體現在外人直接投資審查機制的強化、5G 關鍵基礎設施的嚴格禁令、關鍵稀土元素的自主開發，以及對人工智慧資料中心與智慧醫療等前沿技術的戰略保護。對瑞典而言，確保核心技術的自主性與供應鏈韌性，已被提升至與領土防衛同等重要的戰略高度，成為在零和競爭中實質保全其民主價值與經濟生存空間的底線。

綜上所述，在動盪且充斥不確定性的新國際體制中，瑞典展現了極具戰略清晰度的外交轉向。斯德哥爾摩正以一種更為主動、務實且具備硬實力與技術主權支撐的新姿態，步入全球地緣政治大競爭的新紀元。這場典範轉移不僅為中等強國 (middle power) 在面對地緣政治巨變時如何進行「戰略調適」提供了深刻的理論與實務啟示，亦向世界宣告：在新時代的冷酷現實下，唯有兼具堅實的軍事嚇阻、經濟去風險能力與技術價值鏈同盟，方能實質捍衛國家的生存與尊嚴。

參考文獻

- 吳鵬飛，2023。《女性主義外交政策的形成與挑戰：瑞典、加拿大與臺灣經驗》碩士論文。台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張閔煊，2022。〈近古時期德意志漢薩組織的凌衰作為立夫尼亞爭奪的根源〉《中興史學》19期，頁51-98。
- 郭秋慶，2015。〈論瑞典自行選擇中立戰略之作為〉《台灣國際研究季刊》11卷3期，頁47-62。
- 湯紹成，2023。〈鳥瞰北約2023峰會〉《展望與探索》21卷8期，頁10-18。
- 黃國明，2023。《俄烏戰爭下瑞典與北約安全互動關係之研究——從守勢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解析（2014-2022年）》碩士論文。新北：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
- 楊三億，2024。〈為什麼不中立了？從關鍵時刻、地緣政治與決策模式分析瑞典與芬蘭中立政策調整〉《問題與研究》63卷1期，頁47-101。
- 葉耀元，2020。〈瑞典對中國銳實力的回應：以關閉孔子學院為例〉《戰略安全研析》161期，頁33-39。
- 蘇秀法，1992。〈後冷戰時期的瑞典〉《問題與研究》31卷7期，頁24-34。
- Adebahr, Cornelius, and Barbara Mittelhammer. 2020. "A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to Deal with Iran? Assessing the EU's Options."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November 23 (<https://carnegieendowment.org/research/2020/11/a-feminist-foreign-policy-to-deal-with-iran-assessing-the-eus-options>) (2026/6/23)
- Bigio, Jamille, and Rachel Vogelstein. 2020. "Understanding Gender Equality in Foreign Policy: What the United States Can D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June 29 (<https://www.cfr.org/articles/understanding-gender-equality-foreign-policy-what-united-states-can-do>) (2026/8/28)
- Billström, Tobias. 2022. "Statement of Government Policy 2022."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October 18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22/10/statement-of-government-policy/>) (2026/3/26).
- Braw, Elisabeth. 2022. *The Defender's Dilemma: Identifying and Deterring Gray-Zone Aggression*. Washington, D.C.: AEI Press.
- Detsch, Jack. 2024. "Sweden Is Making the Most of NATO's Waiting Room." *Foreign Policy*, February 4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4/02/04/sweden-nato-bid->

- russia-baltic-sea-turkey-hungary/) (2026/3/25).
- Etzold, Tobias. 2024. "Sweden's Thorny Path into NATO: A Changing Country Is Finding Its New Place." *NUPI Policy Brief*, No. 6, pp. 1-4. Oslo: Norweg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https://www.nupi.no/en/publications/cristin-pub/sweden-s-thorny-path-into-nato-a-changing-country-is-finding-its-new-place>) (2026/4/5).
- Giddens, Anthony. 1991.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4.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Stockholm: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https://www.government.se/information-material/2024/07/national-security-strategy/>) (2026/4/2).
-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2026. "Statement of Foreign Policy 2026." Ministry for Foreign Affairs, February 18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26/02/statement-of-foreign-policy-2026/>) (2026/4/2).
- Häggbloom, Robin. 2024. "Sweden," in Björn Ottosson, and Krister Pallin, eds. *Western Military Capability in Northern Europe 2023, Part I: National Capabilities*, pp. 1-15. Stockholm: 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
- Hall, Peter A. 1993. "Policy Paradigms, Social Learning, and the State: The Case of Economic Policymaking in Brita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3, pp. 275-96.
- Hansen, Torill Settemsdal. 2024. "What If the Arctic Council Dissolves?" in Florence Gaub, ed. *What If...? 12 Dragon King Scenarios for 2028*, pp. 33-37. Rome: NATO Defense College.
- Khorrani, Nima. 2024. "Sweden's Strategic Shift: Navigating NATO Membership and the Path Forward." Arctic Institute, April 23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swedens-strategic-shift-navigating-nato-membership-path-forward/>) (2026/4/5).
- Khorrani, Nima. 2026. "Sweden's Forthcoming Arctic Strategy: A Preview." Arctic Institute, April 2 (<https://www.thearcticinstitute.org/swedens-forthcoming-arctic-strategy-preview/>) (2026/4/3).
- Kinnvall, Catarina. 2004. "Globalization and Religious Nationalism: Self, Identity, and the Search for Ontological Security."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5, No. 5, pp.

741-67.

- LKAB. 2023. "Europe's Largest Deposit of Rare Earth Metals Is Located in the Kiruna Area." January 12 (<https://lkab.com/en/press/europes-largest-deposit-of-rare-earth-metals-is-located-in-the-kiruna-area/>) (2026/4/1).
- Lundqvist, Stefan. 2022. "A Convincing Finnish Move: Implications for State Identity of Persuading Sweden to Jointly Bid for NATO Membership." *Studia Europejskie - Studies in European Affairs*, Vol. 26, No. 4, pp. 73-110.
- Panda, Jagannath, and Mahima Duggal. 2024. "Sweden Joins NATO: Implications for the Indo-Pacific." *Diplomat*, March 11 (<https://thediplomat.com/2024/03/sweden-joins-nato-implications-for-the-indo-pacific/>) (2026/4/7).
- Porter, Tom. 2024. "Sweden Is Exactly What the West Needs to Counter Putin's Underhand Tactics." *Business Insider*, February 27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sweden-exactly-what-west-nato-needs-to-counter-putin-russia-2024-2>) (2026/4/2).
- Spindler, Fanny. 2025. "From Peaceful Neutrality to Strategic Alignment: A Poststructur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Sweden's Path to NATO," Master thesis, Swedish Defence University (<https://www.diva-portal.org/smash/record.jsf?pid=diva2%3A1941638&dswid=9504>) (2026/4/8).
- Stenergard, Maria Malmer. 2024. "Foreign Policy for Swedish Interests." Government Offices of Sweden, December 11 (<https://www.government.se/speeches/2024/12/foreign-policy-for-swedish-interests/>) (2026/4/2).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Wieslander, Anna, Eric Adamson, and Janne Lehto. 2023. "Securing Northern Europe within NATO." Atlantic Council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3/02/Securing-Northern-Europe-within-NATO.pdf>) (2026/3/26).

The Paradigm Shift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2014-26: From Moral Superpower to Geopolitical Realism

David Chu-Meng Wu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paradigm shift in Swedish foreign policy from a “moral superpower” to “geopolitical realism” between 2014 and 2026. In the face of Russian expansionism, Sweden’s two-hundred-year tradition of neutrality and its “Ontological Security” have undergone a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By integrating ontological security theory and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employing process tracing and textual analysis,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causality of its grand strategy reshaping.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weden’s accession to NATO in 2024 served as a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Furthermore, through the *2026 Statement of Foreign Policy*, Sweden has thoroughly abandoned the discourse of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establishing a new strategic consensus centered on “Swedish survival interests” and “Deterrence by Denial.” In practice, Sweden has not only militarized geostrategic chokepoints such as Gotland to construct an Anti-Access/Area Denial (A2/AD) defense network in the Baltic Sea, but also precisely implemented geo-economic de-risking through a stric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ct* and a 5G ban. This provides an explanatory paradigm for small states maintaining strategic autonomy amidst great power competition.

Keywords: Swedish foreign policy, small state foreign policy, feminist foreign policy, paradigm shift, ontological security